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 ④



刺绣作品《采蜜》。



刺绣作品《仙鹤》。



刺绣作品《百鸟朝凤》。

蒙古族刺绣：指尖飞花绣融合

□文图 本报记者 高瑞锋

非遗保护需要守正创新

□一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面对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变化，许多非遗项目存续的环境发生了改变，正是由于非遗传承人涵养时代精神，守正创新、活态传承，才得以让古老的非遗焕发出新活力。

但是，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仅仅依靠少数人是不够的，非遗应该在各方合力下多渠道传播，吸引更多人了解非遗、喜爱非遗、保护非遗，形成社会广泛参与、人人保护传承的良好局面。

非遗创新与转化的核心是传承中华民族的思想理念以及文化精神，从而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论如何创新，都要在研究非遗内在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使其回归传统、回归生活；在不失其本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机。



刺绣作品《马到成功》。

提起手工刺绣，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其实，彝、布依、瑶、苗、土家、蒙古、藏等民族，也都有本民族的刺绣。尤其蒙古族刺绣，因其绣品朴实大气、色调对比浓烈、图案对称丰满、针线平整细腻，具有鲜明的北方民族地域特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58岁的乌仁其木格作为蒙古族刺绣呼和浩特市市级非遗传承人，在她40多年的刺绣生涯中，在传承中把南方刺绣技艺融入蒙古族刺绣当中，使蒙古族刺绣有了新发展。

传统工艺

刺绣，又名针绣，俗称绣花，以绣针引丝、绒、彩线，按照设计的花样，在丝绸、布帛等织物上刺缀运针，以绣迹构成纹样或文字，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一。

古代，刺绣又称黹、针黹，因多为妇女所作，后故又名女红。《尚书》载，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衣画而裳绣”，至周代，有“绣绩共职”的记载。

现代，在湖北和湖南，曾经出土了战国、两汉的绣品，刺绣水平都很高。唐宋时期的刺绣施针均匀，设色丰富，盛行用刺绣作书画、饰件等。明清时，宫廷绣规模很大，民间刺绣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个时期，先后产生了“四大名绣”，即苏绣、湘绣、粤绣、蜀绣。此外，还有顾绣、京绣、鲁绣、闽绣、汴绣、汉绣和苗绣等。

各具特色

都各具风格，历久不衰。

“虽然蒙古族刺绣还没有广为人知，但在历史传承、艺术特征上也具有图案秀丽、色彩和谐、线条明快、针法活泼、绣工精细等特点。”乌仁其木格说，在蒙古族刺绣中，也能看到汉族、满族等其他民族刺绣技艺的影子。

《蒙古风俗鉴》中说：“自周、唐以来汉族的织锦缎就已传入蒙古地区。”明清时期，云锦织绣快速发展，通过互市贸易等方式，云锦织绣技艺流传到北方地区。这些云锦织绣开阔了当地手工艺人的视野，从而使蒙古族刺绣技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清代，满族服饰以及各种刺绣小品在蒙古族中广为流行，当时北京的荷包作坊生产的褙褙、扇袋等精致的织绣小品也传入了北方地区。

初心不改

“刺绣在蒙古族的衣、食、住、行中很普遍。”乌仁其木格说，自古以来，蒙古族妇女就善于刺绣，蒙古族姑娘从小就和母亲学习刺绣，能熟练掌握家中的各种针线活儿。

从七八岁开始，出生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的乌仁其木格就主动跟着母亲和姥姥学习绣各种荷包、袜底等家用衣物，到了十五六岁，她已经熟练掌握了刺绣技艺，开始绣更复杂的花鞋、马海靴等绣品。

18岁，乌仁其木格结婚成家。在婆家，她靠着这份好手艺，闲暇时给邻里乡亲们绣袍子、棉袄、烟口袋等，赚来的钱养活一家人，渐渐在当地出了名。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想在刺绣上面搞出点名堂。1995年，我30岁，经亲戚介绍，来到呼和浩特市一家技校学习了裁剪技术，别人学习1年才能毕业，我只用了3个月就毕业了。”乌仁其木格说，毕业后，她把

绣出大名

家人从巴林右旗接到了呼和浩特市，开始创业。

刺绣情结一直深植在乌仁其木格的心中，她靠着这份好手艺在呼和浩特市生活，更想让更多的人认识、爱上这门手艺。

那年，乌仁其木格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呼和浩特市的大街小巷，确定没有一家刺绣店后，在烟火气十足的团结小区开设了一家裁缝店，同时兼营刺绣。

“我特意绣了一幅名人肖像，摆在店里的显眼处，进进出出的人看见了，总要说一句‘谁绣的，真好。’就这样，接到了刺绣活儿，一天比一天多，名声也越来越响。”她说。

2012年，乌仁其木格被特聘为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多所大专院校的客座教授，专门教授学生们刺绣技艺。

2019年，她成为蒙古族刺绣呼和浩特市市级非遗传承人。

深入学习

2007年，在蒙古族刺绣技艺中深耕多年的乌仁其木格第一次来到苏州市购买绣花线，当她走进一家绣花线批发商城时，立刻惊呆了。商城里的绣花线多达1300种，每种颜色又有深浅之分，仅绿色就分草绿、暗绿、玉绿、青绿、碧绿等十几种颜色，挂在墙上五颜六色，让人眼花缭乱。

她一口气买了1万多元的绣花线，结账时，向老板介绍自己是从内蒙古来的绣娘，并问能不能介绍几个当地的绣娘，她想学习。

“老板很热情，带着我去了3个地方，一个是个体刺绣作坊，一个是刺绣小工厂，一个是刺绣培训学校，这让我大开眼界，见识到了苏绣的魅力。”乌仁其木格说，蒙古族刺绣最大的特点是结实耐用，但是没有颜色过渡，比如绣一片绿叶，蒙古族刺绣只用一种绿色来表现，而苏绣会把十多种绿色都用上，颜色间的渐变过渡非常自然和谐，绣出的花儿、鸟儿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当时，她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用心学习苏绣技艺，创新蒙古族刺绣，让它不仅结实，还更好看。

从苏州回来后，乌仁其木格开始尝试在蒙古族刺

南北融合

绣中融入苏绣绣法，她每绣出一幅作品，就拍下照片发给在苏州结识的刺绣老师，请他们帮忙指点不足之处。

“现在已十多年过去了，在老师们的指点下，我的刺绣技艺早已大大提高。”她说。

在乌仁其木格的墙上，挂着一幅《百鸟朝凤》刺绣作品，这是她按照清代花鸟画家沈铨的名画《百鸟朝凤图》历时半年创作的，也是她融合了南北刺绣技法的得意之作。

这幅作品针法运用的是蒙古族刺绣的针法，颜色配色上运用的是苏绣技法，共使用了130多种不同颜色的绣花线，仅一片松叶，就用了6种绿色，深浅不一绿色的交融，凸显了松叶在光照下的层次感；一只锦鸡的颈部羽毛，小米粒大的地方，使用了11种深浅不同的褐色，羽毛的毛绒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乌仁其木格的心里，认为蒙古族刺绣还可以更好。为了实现这个想法，她又开始向刺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学习更精深的绣法。

“我认为蒙古族刺绣只有在南北绣法结合的基础上创新，才会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她说。



双面刺绣作品《花开富贵》。

【见证】

嘉靖款青花鱼缸：民族交往的印记

□包乌兰

文物是打开历史记忆的钥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璀璨明珠，蕴含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

1983年6月，哲里木盟博物馆（今通辽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白音塔拉乡征集到两件明代嘉靖款青花鱼缸。

这两件青花鱼缸均通高31厘米、口径51.8厘米、底径44.4厘米、重21000克；敞口、宽平沿、口微外撇、腹壁斜直、底心内凹、露胎；器内外施满釉，釉色呈青白色，底部无釉；口沿处饰一周如意纹，腹部绘两条大鱼和数条小鱼，间饰水草纹，整个画面动静呼应，生动逼真；缸口沿处双框内书“大明嘉靖年制”六字单行楷书。

妙的是，纹饰中并没有描绘水波纹，却表现出了鱼儿嬉戏和水草摇曳波漾之感，栩栩如生。游鱼穿梭在水草之间，把鱼儿柔滑的质感和迅疾穿梭的速度感表现了出来，给人感觉好似在欣赏真实的海洋世界。

科尔沁左翼中旗白音塔拉乡是清代多罗郡王府所在地，这两件鱼缸即为多罗郡王府之物，烧制于明嘉靖年间的景德镇窑，当时只烧制了630件。

明青花瓷的装饰，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从成化时期开始，青花瓷除了多用云龙、飞凤、海兽、莲花托八宝、花草、花蝶、花鸟纹饰外，也有用梵文装饰的题材；弘治、正德时期，则多以缠枝花卉、龙纹、八宝以及栅栏树石为装饰纹样；嘉靖时期，青花瓷的纹饰除了传统的龙、凤、花卉纹外，还盛行用婴戏图、莲花鱼藻、海马、八仙过海等纹样表现主题。在艺术风格上，成化时期的青花瓷清淡高雅，嘉靖时期的青花瓷逸趣多样，万历时期的青花瓷秀美精彩，但是不论哪种装饰纹样，都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和文化倾向。

明后期的嘉靖与万历时期，因材料更新、制瓷技术升级，青花瓷的产量与质量得到大幅提升。这两个时期青花瓷纹样的特点大多是器身饰一主图，辅饰配以回纹、几何纹、花纹等纹饰。

像这两件青花鱼缸，它们烧制于嘉靖后期，主图是“鱼游大海”，接近器身底部的位置用植物纹进行装饰，顶部口沿的位置用花纹进行装饰，用这两种纹样装饰，不仅可以突出器身的主要画面，还可以使纹样装饰上下均衡，视觉效果达到最优。

受当时社会文化影响，嘉靖时期的青花瓷装饰主要以云藻纹为主，但是也有云鹤、瓔珞纹等纹样的装饰，而万历时期的纹样装饰则经常采用婴戏作为纹样装饰的主要题材。

在明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因釉料变化，青花瓷的色调也会不同。嘉靖时期的青花瓷多采用西域的回青料为着色剂，同时与乐平的皴塘青料、瑞州的石子青料等配合使用，烧制出的瓷器最终呈现出蓝中微泛红紫的艳丽色调，特色鲜明。

后来，因引入了苏泥勃青料等外来装饰涂料，明代中后期的青花瓷纹样装饰得到了创新。明代青花瓷的生产在明清两代长达600多年的时间里长盛不衰。

总体来说，青花鱼缸等瓷器出现在民族地区，不仅说明明代的陶瓷业非常繁荣，更显示了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展现了中国在大一统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兼容并蓄的深厚历史。